



《史記》新論

白
寿
彝

求实出版社

《史记》新论

白 寿 彝

求实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司马迁编著的《史记》，是我国封建时代史学的优秀遗产，一向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和推崇。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曾于一九六三年五、六月间，给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班学员讲课，对司马迁编著《史记》的宗旨、历史背景、写作方法以及《史记》在我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贡献，作了较系统的论述，并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见解。现将白寿彝教授的讲课记录稿整理出版，供广大读者与史学研究者参考。

求实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十一月

目 录

一、《史记》写作的历史背景	1
二、“究天人之际”	20
三、“通古今之变”	37
四、“成一家之言”	51
五、“寓论断于序事”	72
六、空前的巨著，优秀的楷模	74
附：	
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	77

一、《史记》写作的历史背景

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是大家熟知的历史名著。他在《报任安书》（注）中说，他写《史记》是为了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这三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《史记》的写作目的是研究“天”和“人”之间的关系，把从古到今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大势搞清楚，成为司马迁一家之言。现在看来，司马迁自我评价的这十五个字还是比较全面的，它既表达了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的目的要求，也概括了《史记》这部书在史学上的贡献，是对《史记》这部书的最好评价。

司马迁为什么提出这十五个字？这是有一定的历史条件、历史背景的。

《史记》写作的历史背景，可以从西周末年共和执政

注：《报任安书》是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（即任少卿）的一封信。在信中，司马迁以激愤的心情叙述了自己因李陵事件蒙受官刑的冤屈，同时说明自己之所以忍辱负重地活下来，是为了完成《史记》的编著，“亦欲以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”《报任安书》是一篇感人很深的著名佳作。

时说起，一直讲到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为止。平常讲历史背景，一般只讲当时几年或几十年的事情，为什么这里要讲几百年呢？因为这几百年，无论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或从历史研究的发展来说，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。《史记》的作者一方面接受了当时经济、政治发展的影响；另一方面又继承了过去几百年来史学思想和历史研究成就的传统。

《史记》的写作开始于公元前一〇四年，到公元前九一年前后才写完。从西周共和执政（公元前八四一年）到司马迁开始写《史记》，共有七百三十七年。在这个时期，社会发生了大变动。

西周和西周以前的历史，所记录的都是王朝的事情。尽管殷商、西周都有许多藩国，但从甲骨文来看，记载的都是王朝的活动。从《两周金文辞大系》中也可以看出，西周的作品也都是王朝的作品，没有记载诸侯的作品。《尚书》里的《商书》、《周书》也是讲王朝的活动。《诗经》里的《周颂》、《大雅》还是王朝的东西。王朝以外的历史记载很少。

从西周末年开始，王朝以外的历史记载才多起来。诸侯之国的活动，从鲁国、齐国、晋国、卫国开始，有了记载。有纪年可考的以鲁国为最早，其他国家大多从共和执政（公元前八四一年）以后的历史记载才有年代可考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西周末年是个变化开始的时期。武王

灭纣以后，大规模封侯建国，山东东海，黄河中下游，到处都是它的侯国，同时，把周人的农业技术也带出去了。他们利用被征服的当地人民作为劳动力来开发土地，这在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里都有记载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王朝与侯国之间、侯国相互之间往来逐渐增多，矛盾也逐渐多起来了，有阶级矛盾，也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。王朝与侯国之间、侯国与侯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彼此的冲突都随着往来的频繁而增加，因而历史的记载也多起来了。从现在留下来的史书看，如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，早从西周末年，晚到周平王末年，记载的都是有关征伐、会盟、朝聘、往来的事情。这些历史记载反映了在当时社会经济相当发展的条件下，彼此关系的复杂化。所以，从西周末年起，特别是从东周平王起，诸侯各国的历史也开始发展起来。这个时期正象通常历史学家说的那样：周天子权威旁落，诸侯掌权了。经过春秋、战国时期，秦统一了全国。秦统治的时间很短，但战争却很多。秦汉之际，斗争也很激烈，发生了陈胜、吴广起义，楚汉争霸。结果，由汉高祖称帝。此后，又从汉高祖传到汉武帝。《史记》的主要内容就是反映这些历史过程、事件和人物的。五帝和夏、商、周的事情讲得很少。

从西周末年到汉武帝统治的七百多年间，历史的变化很大，一个变动接着一个变动。从一个王国分封出

好多侯国，其后又相互兼并，出现了战国七雄，随后秦又吞并六国，统一全中国。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变化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史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论。如果说西周是封建社会，那末这七百多年的变化，就是从地方割据的封建社会发展到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；如果说西周是奴隶社会，那末最晚到春秋末年，社会性质就开始发生变化，到汉武帝时，封建社会形成了，各种制度基本上都建立起来了。汉武帝的活动，给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因此，不管从哪一种分期的观点来看，这个时期都是一个大变动的时期。

《史记》写作的历史背景，就是这样一个漫长的、不断变化的历史时期，也就是中国形成统一的封建大国的时期。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带阶段性的时期。在司马迁以前，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曾将春秋时期的历史作过总结，但它们包括的时期很短，只有二百四十多年，写得也不够完整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发扬了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的传统，综合了他所见到的历史记载，对这个变动时期的历史作了总结。从此以后，每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，都有历史著作出现，为前代作总结。比如魏、晋、南北朝的历史，隋修过一次，唐初又修过一次；唐中叶时，杜佑著《通典》，把唐中叶以前的历史作了总结；北宋司马光著《资治通鉴》，又把五代以前的历史作

了总结。可以说，这个传统在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里已经有了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则进一步发扬了这个传统，并为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。

从历史观的变化来看。在西周末年以前，人们的历史观，主要是宗教的历史观，包括两个内容：一是对至上神——即最高的、主宰自然的神的看法；一是对祖先神的看法。这种对神的看法在殷商的甲骨文中充分反映出来。据郭沫若同志研究，殷商的祖先神与至上神是合而为一的。王室的祖先死了以后就成了最高的神，殷王都可以成为“示”，“示”就是神。甲骨文有“六示”、“十示”的字样，也就是六代、十代的祖先，在世为王，死后为神。地上的王权反映到天上就是神权，这就是祖先神和至上神统一的观念。

西周时期，对神的观念有了变化，至上神被叫做上帝，同祖先神分了家。上帝是周人的神，也是各诸侯国家的神。这就把殷人的神世界化了，凡周人的势力达到的地方，都信奉同一的神，把信仰统一起来了。同时，各国又各有自己的祖先神，周人最大的祖先神是文王。《诗经·大雅》说：“文王在上，於昭于天”。这就是说文王老是在上帝的左右，影响、传达上帝的旨意，要子孙都跟着文王学，其他祖先神的位置都不能和文王相比。周人这种宗教观念是适应当时封侯建国的形势需要的。

尽管周人同殷人对神的观念有这样的不同，但都还

是宗教的历史观。就是说，他们都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神支配的，是按照神的意志发展的。到了两周之际，社会起了变化，宗教的历史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社会矛盾增加了，有许多现象是宗教的历史观所不能解释的。随着各地侯国的发展，王权开始动摇，人们对神也产生了怀疑。虽然还不敢说没有天，没有上帝，没有祖先神，但上帝、祖先神究竟管不管事，人们有了疑问。《诗经·大雅》是西周晚年的作品，里面表现的怀疑色彩相当浓厚，不大相信上帝、祖先神能管事。这实际上是王权动摇的反映，在历史思想的发展上是一件大事。随着春秋时期社会情况的变化，怀疑思想也有了发展，但还是不能说不要天了，只是采取了保留的形式，表现为“天道远，人道迩”的思想，本质上是要把天道束之高阁，转而注意人道的问题了。这也反映了人们对至上神的看法有了变化。当然，这种思想并不是完全不信神了，它是同许多迷信的东西夹杂在一起的。但在当时，这就是新思想，是进步的。

另外，春秋时期对祖先神的看法也有了变化。不过这个变化比较保守一点，就是《国语》所说的：“凡有大功于民者，子孙必昌”。意思是说，当代贵族就是夏禹、后稷等人的子孙，他们将来一定要昌盛。这是贵族“轮流坐庄”的思想，已经同过去成汤或文王之子孙永远保持王权的思想不一样了。还有一种更为进步的思想认

为，虽然是“有大功于民者”的子孙后代，当他做了坏事，不为人民所拥戴的时候，也一样要下台；祖先虽然没有地位，但其子孙立了大功，受到人民拥戴的，也可以昌盛。这个思想已经把祖先神推开了，认为主要要看本人的功业和威信。这比两周之际仅仅怀疑祖先神管不管事的思想又有了进步。

到了战国时代，产生了变法思想，最突出的是法家思想。从商鞅起，就不管什么上帝、先王那一套，而讲“三代不同礼而王、五伯不同法而霸”。后来韩非、李斯都主张变法。战国末年，秦要统一全国，就大力提倡变法思想，不承认至上神和祖先神，否定旧秩序。所以，法家思想当中最突出的就是变的思想。

上述情况说明，从两周之际到秦的统一，在历史思想上有两个大问题：一个是“天人之际”的问题；另一个是“古今之变”的问题。天人关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，也就是社会关系在人们思想上的一种反映。当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时，人们对天与人的关系的看法也就随之变化。从统治阶级来看，天代表独断的、不可动摇的、永恒的统治阶级；从被统治阶级来看，天的统治是可以变的，是可以怀疑的，甚至也是可以用人来代替的。当商王或周天子的统治比较巩固的时候，人们对“天”的统治是没有怀疑的，天是高高在上具有无上尊严和威力的主宰；当人们对“天”的统治产生怀疑、动摇的时候，实际上反

映了某个阶级或某个集团的统治在动摇，或者要灭亡。在“古今之变”的问题上也是一样，主张政权统治不变的总是快要下台的统治阶级，主张变的则是要求当权的阶级或集团。

秦统一以后，情况就和统一前不同了，它要建立自己的统治秩序，要把上帝复活起来。不过秦始皇的经验不多，这方面做得还不到家，他只是封禅名山大川，祭祀天神，表示他的土地、人民受之于天，可以传之万代，而他自己的统治就是万古不变的神的统治。这实际上还是祖先神的思想。他好大喜功，穷奢极欲，引起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。不仅人民反对他，贵族也反对他，都要起来推翻他的统治。于是，随着形势的发展，又出现一种新的观念，这就是项羽所说的“彼可取而代之”，刘邦所说的“大丈夫当如此也”，陈涉所说的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。这些说法和秦始皇的“二世三世至于万世，传之无穷”是针锋相对的。

陈涉起义也还利用了一下宗教迷信思想，搞了一个“鱼腹获绶”，号召大家起来反抗秦的统治。司马迁写这个事件的始末过程很有意思，这对当时的宗教迷信思想是个讽刺，是反对天命思想的。当然，陈涉利用宗教号召人民起义，和秦始皇利用宗教统治人民有本质的区别。

陈涉起义和刘邦做皇帝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事

件，但时代很相近。秦末农民起义一发动，就有很多人起来，很快便把秦朝灭亡了。刘邦出身不过是一个小亭长，后来居然做了皇帝，这在当时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过，可以说是震动人心的大事，在人们的思想中印象很深。

汉初，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一些，阶级矛盾不那么尖锐。由于刘邦杀了一些大臣，同姓诸侯又图谋叛变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尖锐起来。汉文帝设法把大的封国分成小的封国，汉景帝又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力量，并在七国之乱平定后，取消了王国的独立地位，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，才奠定下来。直到汉武帝时，专制主义的制度才巩固下来。

汉武帝为了巩固专制主义的制度，从各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，作了一番建树的工作。经济方面实行盐铁官卖，这是一种很重的封建剥削。因为人不吃盐不行，生产没有铁不行。盐铁官卖，就是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经营。盐价、铁价不断提高，简直是对人民的一种掠夺。同时，他还用均输平准的名义，把大量财富集中到中央，又让商人登记财产，向他们征收财产税，隐瞒不实报的没收财产，没收商人的土地等。这些措施实际上是用专制主义的办法，大量进行封建性的掠夺。政治方面的控制也很紧，任用了不少酷吏，囚禁对他不满的官吏。在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里面反映了不少由于实行严刑峻法而引起武装暴动的材料。文化方面，他也没有放

过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讲公孙弘向汉武帝上书，说汉武帝给臣下的诏书、律令都是“明天人分际，通古今之义”。可见汉武帝很重视这两条。所谓“天人分际”、“古今之义”是什么东西呢？汉武帝所提倡的，并不是从秦以前就不断发展起来的进步思想。“明天人分际”实际上是提倡阴阳灾异的学说，也就是用“天意”来解释一切自然灾害和奇奇怪怪的事情，通过这种学说，给皇权罩上一层神秘的外衣，使它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。“通古今之义”就是在儒家定于一尊的形式上，利用儒家经典，宣扬封建制度是永恒的，封建统治的秩序是不可变易的。他们为了尊崇儒家，有时甚至在判决案件的时候，也引证《春秋》作为断狱的标准。

由此可见，秦始皇统一以后，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看待“古今”、“天人”的关系问题，仅仅有个苗头，到汉武帝时才逐渐明确起来。这时候的“天人分际”、“古今之义”显然和秦统一以前不同了。汉武帝时期，在历史观上出现了两种思想：一种是适应王朝统治要求的正统思想，以董仲舒为代表。他说：“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。”这个意思就是天人合一，古今永恒。儒家一尊，也是董仲舒的建议。他说，现在有各种学派和议论，妨碍统一，所以要发扬《春秋》的大一统思想，取消各家学说，定儒家于一尊。这是典型的正统思想。和董仲舒的正统思想相反的，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一派思

想。司马迁继承了秦统一以前历史观的优良传统，并有所发展。他在《报任少卿书》中所说的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正是和董仲舒的思想针锋相对的。董仲舒是他的老师，他跟董仲舒学过公羊学，不过他不属于公羊学派。他主张“究天人之际”，而不同意“道之大原出于天”；他要“通古今之变”，首先肯定有变，不是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；他要“成一家之言”，就是要自成一家，而不是儒家独尊。所以说司马迁的思想是进步的，道理就在这里。司马迁不反对统一，但反对暴虐专制；他不主张农民起义，但认为搞政治要得人心，应该对人民有好处，否则，你的统治就不能巩固。有人把司马迁抬得太高，说他歌颂陈胜等农民领袖，歌颂农民起义。实际上没有这种事情。但他的思想，在当时来说，的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些愿望。

从历史编纂学的源流发展来看。《史记》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纪传体的书。说它是纪传体，还不能算是一个很完备的说法。二十四史中《史记》以外的书，有的没有表或志，但各书都有纪和传，所以统称为纪传体。《史记》不但有本纪、列传，还有世家、表、书。诸侯之国，或者某方面有成就的、影响大的人物都有“世家”，如《孔子世家》、《陈涉世家》等。说《史记》是纪传表志体的书，更合适些。

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来看，《史记》应该说是综合

体。它把过去记载历史的各种体裁都综合起来了。虽然其中任何一种历史体裁都不是独创，但经过综合提炼，使它们相互配合成为一种完整的形式，却又是新的东西。司马迁搞出这种体裁很简单，不是单凭他的能力就能办到的，这同长期以来的历史渊源有关。

司马迁以前，没有一部具有完整规模的历史记载。据现在掌握的文字资料和考古材料来看，最早的记载是甲骨文。甲骨文以前有没有记载？不敢说没有。现在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，也有些比较早的、类似文字的东西，但材料比较少，而且不能断定它就是最早的文字。

甲骨文算不算历史记载？从原来刻甲骨文的主观意图来看，不好说是历史记载。它的内容约有这样四部分：一部分是占卜的日子；一部分是为什么事占卜；又一部分是占卜的结果；还有一部分是关于占卜以后的实际效验的记录。如某一天要到某地去打猎，事先占卜是“吉”，结果打猎得到了鹿、鸡、兔等，这就是占卜以后的实际效验。这一部分不是每片甲骨文都有，许多甲骨文只有前三部分。就是有实际效验部分的，当时的主观意图也不是为了载入史册或流传后世。总之，甲骨文很简单，由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活动四个部分构成。反映在甲骨文中的时间观念是很贫乏的，一般只有干支计日，后来才慢慢有了月，很少纪年。记时间的次序是

日、月、年，有点象现在西欧人的记法。甲骨文是最简单的文字记录，它初步具备了历史记载的最简单的形式，同后来的历史体裁有关系，可以说是后来编年体记载的始祖。

甲骨文的字数不多，少者几个字、十几个字，多者也不过几十个字、百把字。郭沫若同志的《卜辞通纂》中，有一片甲骨文有六十三个字；现在还发现有一百多字的，不过六十个字以上的甲骨文不多，一般只有二、三十个字。但金文就不同了，一方面是时间比较长，从殷商末年到秦的统一都有，而主要是在西周；另一方面字数也比甲骨文有所增加。西周时期的金文，字数在一百字到五百字左右的已有相当数量。它记载的内容比甲骨文丰富了，对事情的发展过程有了记述，还有记言的。金文在时间观念上也比甲骨文有所发展，表述时间的形式有两种：一种是日、月、年，另一种是年、月、日，这是后来通用的办法。

与甲骨文、金文同时并行的还有《书经》。《商书》的著作年代问题较大，其中《盘庚》篇很古奥，不好懂，一般认为可能是殷代的东西，但也经过了后人的加工。这篇文章有一千多字，估计不会是盘庚时的著作，但保存有殷代的东西。《周书》比较可靠一些，它的内容和《商书》一样，主要都是帝王、贵族的语录，但也有新的东西。其中《金縢》、《顾命——康王之诰》两篇，从历史